

陳

炎

文

集

宋元史稿



陈 炎 文 集

下 册

陈 炎 著

中 华 书 局

七、东海丝绸之路研究

东海丝绸之路初探

——唐代以前的东海航路和丝绸外传及其影响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美丽而富饶的土地和漫长的海岸线,又有许多良港和海湾。黄河长江哺育着我们勇敢勤劳的人民。我们的祖先在此生息,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历史有着重大贡献的养蚕、织绸的生产技术,就是我们祖先最早发明的。从远古时代开始,他们就把丝绸外传和征服海洋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开拓出一条条丝绸外传的航路——海上“丝绸之路”;并以丝绸为纽带,同海外各民族发生了互利的友好往来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本文就我国生产丝绸的历史和丝绸外传的航路来论证唐代以前东海“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作些初步探讨。

一、我国生产丝绸的历史和早期的东海航路

我国的养蚕、植桑、缫丝、织绸的生产技术,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过去人们都以为我国产丝区最早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近年来,根据考古发现证明长江流域的产丝织绸,有些地方甚至比黄河流域还要早。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距今七千年的新石器遗址,出土了许多与纺织有关的黑陶上刻纹纺轮、纺砖和织

机零件。在出土的牙雕小盅……外壁雕刻有编织纹和蚕纹图案^①。蚕纹形态逼真,它比江苏吴县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黑陶上绘的蚕纹^②,描绘得更形象,更生动。说明当地人民在这样早的时代,对蚕丝已经有所认识了。早在 1956—1958 年在浙江吴兴距今四千七百余年的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盛在竹器夹层里的丝织品,有丝帛(绢片)、丝带和丝绳等^③。这是我国出土最早、最完整的丝织品。证明长江流域至迟在夏代已经生产丝绸。

公元前 494 年吴越相争,越国成了吴国的附庸。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采纳谋臣范蠡和文种的建议,大力发展蚕桑丝织,以图复国,从而促进了越国丝绸生产的发展。那时越国已能生产:帛、丝、罗、纱、縠。如《嘉泰会稽志》说:“縠首见于越国。”越国美女西施“浣纱”的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地区的丝织业已经兴起。

随着丝绸生产的发展,作为产品交换的丝绸贸易也开始产生。如《诗经》中的《卫风·氓》中就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译意:“那个笑咪咪的汉子,抱着帛布来交换生丝。”)这句诗告诉我们,远在周代生丝和丝织品已在民间市场上进行交换。在殷墟的甲骨文中还有:“匹马束丝,抵五名奴隶”^④等语,这又从另一角度,来证实丝绸贸易在奴隶主与贵族之间也在进行。据《后汉书》记载,会稽人朱儁是东汉时的名臣,“少孤,母尝贩缁(丝绸)为业,同郡周规……假郡库钱百万,儁乃窃母缁帛,为规解对”^⑤。一个寡妇经

① 《文物》1980 年第 5 期;《蚕桑通报》1981 年第 1 期。

② 《考古》1963 年第 6 期;《蚕桑通报》1981 年第 1 期。

③ 高玉汉:《出土文物追溯蚕丝业的起源》,载《蚕桑通报》1981 年第 1 期。

④ 郭沫若:《青铜时代》引“殷墟甲骨文”。

⑤ 《后汉书·朱儁传》卷七一。

营丝绸贸易,被儿子偷去的丝绸一次就价值百万,可见其规模之大,又能立即转手出售为其友还债,说明当时浙江已经有繁荣的丝绸贸易的市场。再有《后汉书》和《三国志》中提到:“亶洲在东海中……其上人民,时至会稽货布。”文中“货布”,因为当时还没有棉花,不可能是棉布。很可能是麻制的“越布”或“布帛”(丝织品),可见当时的会稽(今绍兴)已经与海外发生了丝绸贸易。

北方黄河流域的产丝区主要在山东半岛,如兖州、青州是历史上著名的产丝基地。据《禹贡》记载,兖州“桑土既蚕,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贡盐絺,厥篚縠丝。”所以人们都说:“山东多丝”,“齐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故有“齐鲁冠带衣履天下”之称,可见桑蚕、丝织业的发达。山东地区的丝织业既然如此发达,而兖、青二州自古就是著名的造船基地^①。山东半岛又与朝鲜半岛只有一水之隔。上述这些社会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就构成我国的养蚕、缫丝、织绸等生产技术,为什么最先从我国经海路外传到朝鲜,然后再从朝鲜传到日本的原因;也是形成海上“丝绸之路”中最早的一条航路——东海航路的条件之一。

我们祖先征服海洋的活动: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因渔猎的需要,已能“剡木为舟,剡木为楫”,制造船只。近年来,在浙江“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中,就发现这种古船的桨^②,据《竹书纪年》说,夏朝的统治者就已经“东狩于海,获大鱼”。殷墟出土的鲸鱼胛骨,证明商代已经有了航海活动。再从《诗经·商颂》中,有“相土烈烈,海外有载”来看,可知当时我国同海外各民族已经开始有了往

① 详见《三国志·魏明帝纪》第109页。

② 河姆渡出土文物中的桨,柄部与桨叶采用同一块木料制成。残长63,宽12.2,厚2.1厘米。详见《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载《文物》1980年第5期。

来。

据《国语·齐语》记载：“越裳献雉，倭人贡鬯(畅)。”文中的“越裳”就是今日的越南，而“倭人”就是今天的日本。这一记载如果可靠，那么，早在西周时，我国已经通过海路东与日本，南同越南已有了海上往来。

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浙、闽、粤、东南沿海地区的越人，据《越绝书》卷八记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可见他们已经掌握了相当熟练的航海技术，海上活动也相当频繁。

秦始皇进军岭南的动机之一，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就是为了想获得“犀角、象齿、翡翠、珠玑”，而这些货物都是从南海诸国输入的舶来品。可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在广南地区已经出现了海外贸易。

徐福东渡的故事：据《史记》、《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仙药，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去蓬莱（在今日本）^①。关于徐福浮海去蓬莱山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仙药的传说，同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航路的开辟有直接关系。这个故事求仙药虽属迷信，但并非无稽之谈。在日本传说徐福渡海登陆的地方就在日本新宫市熊野浦。至今新宫市以东三公里仍有蓬莱山，并建有徐福祠。在和歌山县新宫市仍然保留着“秦徐福之墓”^②。

据《史记》记载，徐福到日本的年代是在公元前 210 年。这时日本正好开始进入弥生式陶器时代。这绝非偶然的巧合，日本著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二》。

② 徐福墓有杨恩朴拍摄的实物照片。见科教影片《海上丝绸之路》。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 页。

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弥生文化并不是绳纹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外来的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①”考古发掘还证明,在绳纹文化的石器还未发展到磨制阶段时,突然出现比日本列岛固有文化先进数千年的弥生式文化,开始铁器与石器并用,并且与弥生式土器同时出土的铁器也都是中国秦汉时的用品。“这种新的和旧的文化,未按阶段发展而同时并存多元性的特点^②”,足以说明徐福东渡日本并非是无稽之谈的神话。学者们认为日本产生弥生式文化与徐福东渡的时间不相上下。再从1966年在属于弥生中期初的立岩遗迹(在福冈饭冢市)发现包裹着素环头的丝织物。它是日本出土最早的丝织物,具有浓郁的中国大陆色彩,因而专家们认为弥生文化是由日本神话传说中渡海征服日本的王者(似指徐福)带入的^③。出土文物中还有汉代铜镜……等,可见它和我国古代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徐福东渡的影响:徐福东渡时所带的舟师和百工,对推进日本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不久,日本即能制造可以在近海航行的“天鸟船”了,并且还有一些不太从事耕作而专门航海的“海男”^④。我们认为《四夷广记》中记载徐福东渡时还带去“珍宝、五谷”。特别是五谷稻种的传入,对日本的农业乃至弥生式文化^⑤的产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中村新

① [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② [日]井上清:《日本历史》,页同上。

③ [日]布目顺郎:《从历史谈日本文化与蚕丝业》见1984年1月《丝绸史研究资料》第七期。

④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第7—8页。

⑤ 弥生式文化是指日本历史上金石器并用时期的文化特征,其年代起迄大致相当于公元前各三个世纪。因为1884年在东京文生区弥生町发现陶器而定名为弥生式文化。

太郎所说,稻种的传入日本,“完全靠渔猎为生的人民结束了那种为追逐野兽而四处迁徙的漂泊不定的生活,开始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组成了‘村落’,努力‘种稻’,从不开化向文明迈出了第一步。无论如何,稻米要比其他一切值得感谢。米与牲畜、贝类不同,可以长期贮藏。不久‘村落’集成了‘国家’。弥生时代的人与中国人正相反,他们把传来稻米的西边(指中国——引者)看成是美好的乐园,把西边称为‘常夜国’。……关于徐福的传说和对‘常夜国’的向往,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日中两国之间交流开始之遥,命运相连之深。”^①

其次,率数千童男女入海,除了带去要解决生活上最必需的五谷(粮食)之外,不可避免地也会带去要解决穿衣的布帛(丝织品),正如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前面所指出的,日本出土最古的丝织物,很可能是在徐福东渡时传到日本的。

二、秦汉时期的东海航路和丝绸外传及其影响

中国蚕丝传入朝鲜:我国的山东半岛在地理上和朝鲜、日本只有一水之隔,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而山东半岛正如上面讲的那样,既是我国著名的产丝基地,又是造船、航海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就为我国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生产技术最早东传到朝鲜,然后又从朝鲜传到日本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公元前1121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后来秦始皇兵吞六国,燕、齐、越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不断泛海迁徙朝鲜,带去了农业生产技术和铁器等生产工具。当

^①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时朝鲜半岛南部分为三韩:西南为马韩,其东为辰韩(多数是中国移民),东南为弁韩。秦汉时,中、朝关系非常密切。正如《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迁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国出铁,涉(今江原道地区)、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货)[贸]易,皆以铁为货。”可见早在周秦两汉时期,我国不但丝织品,就连养蚕缣丝织绸的生产技术和知识,也传布到朝鲜,并且和日本、朝鲜发生了互市的贸易关系。三十多年前,在朝鲜平壤市乐浪区土城附近,在一千多座汉墓中还出土大量文物,其中就有:汉代的绢、罗等丝织品。这是我国丝绸传入朝鲜的历史见证^①。

中国蚕丝传入日本:中国的丝绸和蚕种最早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早在两汉时就有不少中国人从朝鲜东渡日本,并带去了原始的养蚕取丝技术。这在日本民间故事和稗官野史里都有叙述。到汉代两国才有官方的正式文字记载。

《后汉书·东夷传》:“光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公元1784年在日本博多湾志贺岛发掘到一颗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就是上述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的印绶现被视为日本的国宝。这颗金印的复制品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是中日两国在汉代时就有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此外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记载中还提到献生口百六十人,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认为生口就是“奴婢”(男女奴隶),是由三十余小国分担的。为什么用人作礼品呢?

① 王逊:《朝鲜古代艺术和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在平壤出土的还有:汉代的铁器、铜镜等,1959年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赠送我国一件在平壤出土的漆盘。中国历史博物馆存有实物照片。

他回答说,当时日本正处于弥生时代中期,日本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不出赠送的礼品,国王们可能最后决定还是送奴婢较好。他们切望获得赏赐丝绸、铜镜等回礼。当然根本不会考虑用来换取这些物品的奴婢们的痛苦。(《日中两千年》第11—12页)应该指出的是,居然用人来换取我国丝绸等货物。可见中国丝绸等物在日本很早就享有盛名,是统治阶级亟望获得的奢侈品。这从崇神天皇的陪葬古墓(今天理市柳本镇)中出土的细密平纹绢^①以及在博多湾附近的须玖遗址(在今福岡县)所发掘的一个“国君”的古墓中出现了铜镜、铜剑和丝绸残片等葬品就是最好的例证。可见早在汉代,中国丝绸、铜器等已经通过朝鲜半岛从海路传入日本列岛。

中国蚕种东传日本,据《日本书纪》等记载、是在仲哀天皇八年(199)有一个自称是秦始皇的第十一世孙,名叫功满王,把蚕种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东传到日本的。这和我史书《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记载:“产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的年代,大致相近,可互相印证。《后汉书·东夷列传》中也有:“倭(日本)……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虽然《后汉书》较《魏书》成书较晚,是宋范曄撰写,但两书的记载类同。这是两国史书记载我国养蚕织绢的生产知识传入日本的开始。

三、三国时的东海航路和丝绸外传及其影响

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经朝鲜半岛到魏都洛阳,赠送班布等礼品,魏明帝诏封“亲魏倭王”并赠以精美的丝织品:绛

^① [日]布目顺郎:《从历史谈日本文化与蚕丝业》。

地交龙绵五匹,绛地纁粟罽十张、藕绛五十匹,紺青五十匹;又赐女王紺地句文绵三匹、白绢五十匹、铜镜百枚等礼品^①。

这是我国各色丝织品作为外交上的交换礼品而大量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在这以前丝绸作为交换商品,早就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②。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丝绸外传日本,是作为外交礼品,而不是作为商品外传。它已超越经济范畴而开始成为政治上的敦睦邦交和联系两国友好往来的纽带,也可以认为这是中日两国最早的“丝绸外交”。此后,两国的友好使节不断往来。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倭女王在十年之中曾四次遣使而魏使也两次访倭。还应该指出的是,魏明帝赐赠倭女王的各色精美丝绸,再经过倭女王遣使到中国的实地考察和了解又把当时中国的提花、印染等纺织技术也带回日本。这时日本已经开始吸收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技术。时过五年之后,当倭女王再遣使至魏时,已经能献“倭锦、绛青缣、绵衣……”等丝织品,作为给魏国帝王的礼品了。当然这时日本的丝织品还处于初级产品。据在冈山县津山市的月轮古坟中出土仁德朝(313)的平纹绢八十种以上来分析,日本学者布目顺郎认为这种平纹绢质地较厚,可能与上述称“缣”的织物相当,估计是用无扣织机织成的,比以前原始织机的效率提高了五至六倍。

据日本《神代记》记载北九州虽已养蚕但抽丝还是沿用“口里含茧抽丝”的原始方法。但它是中日两国“丝绸外交”和文化技术交流的嚆矢。

这时,中日两国以丝绸交换作为外交上的礼品,从而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往来以及文化和生产技术的交流,它不仅表明了“丝绸外

①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卷三〇。

② 详见前面已引《后汉书·东夷列传》卷八五文。

交”所取得的胜利,而且也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写下了珍贵的一页。

四、南朝时的东海航路和丝绸外传及其影响

日本向南朝遣使早期大都掠过朝鲜半岛,因为当时航海技术还处于幼稚阶段,沿海岸线航行比较安全。其航线走向:从难波(今大阪)→博多(今北九州)→松浦→壹岐、对马等岛屿→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沿辽东半岛→越黄海或渤海→山东半岛,再沿海岸线南下航行至建康(今南京)和它的咽喉——扬州。正如《文献通考》记载:“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上文中“南道”是指山东半岛南下的南道,不是指唐代开始自日本的博多直接起航,不经朝鲜半岛越东海而至长江口的南线(图7—1)。

据日本史书《古事记》记载,中国丝织和缝纫技术的传入日本,从西晋开始就有明确的纪录。应神天皇时代(270—309年相当于我国西晋),百济曾向日本“贡上两个有技术专长的人,名叫卓素的韩缎,以及名叫西素的吴服”(见《古事记》中卷《应神天皇》)。上述“吴服”就是用中国(吴,指江浙产的)衣料和缝制衣服者的总称。又据《日本书纪》说,公元308年,应神天皇“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织工女。……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见《日本书纪》卷一〇应神天皇39年)。

南朝时,日本雄略天皇(457—497)十分重视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曾派专使到我国江浙一带寻找丝织缝纫女工到日本传授技术。469年,应日本雄略天皇之邀,中国又有汉织、吴织等织工自浙江东渡日本。他们所往之地称为吴原(见《日本书纪》卷一四雄略天

皇十四年)。因此学者们认为日本的和服(又称吴服)就是起源于浙江传入的丝织工艺和缝纫技术。中国的丝绸也必然随丝织女工传入日本,只是不见文字记载而已。中国的凸版印花技术,也在这时传入日本。雄略天皇为了发展养蚕事业,在日本还流传着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据日本《古事记》说。天皇想让皇后和宫女们在宫里养蚕,就令一位名叫螺瀛的人,要他向全国搜集一批“蚕儿”送进宫来。在日语里“蚕儿”和“婴儿”的发音相同,因而螺瀛误以为天皇要他寻找一批婴儿,于是他从全国各地搜集了一批“婴儿”,让宫女们抱着送进宫来,天皇一见不禁捧腹大笑,只好下令由螺瀛来抚养这批婴孩^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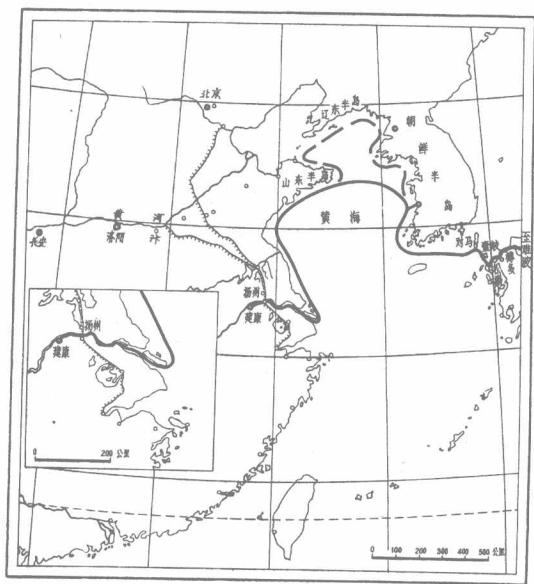


图 7-1 南朝航路示意图

^① 见《日中两千年》第 35 页。

这个故事反映了日本引进中国蚕种后,这时已普遍养蚕,而且受到天皇的特别重视。他想模仿中国的“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蚕于北郊,以供纯服”(见《礼记·祭纪》),由宫中的王后或妃子带头养蚕做个示范,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男耕女织”。

汉人移居日本及其影响:据日本方面记载,早在应神时代(270年开始),就有从朝鲜半岛居住在乐浪和带方郡的秦人、汉人大量迁徙到日本列岛。由名叫弓月君(融通王)的人,据说是秦始皇的后裔,于283年率领一百二十县的秦人和由另一位叫阿知使主父子,据说是后汉灵帝的后裔,于289年率领十七县的汉人,先后移居日本^①。上述一百二十县……等数字,未免过于夸大,但移民人数确实不少则是事实。据后来《雄略记》和《姓氏录》的记载,到雄略天皇时已有秦人等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人,另据《钦明纪》记载,钦明天皇元年(540)秦人的户数是七千零五十三户^②。

有那么多的汉人,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1. 他们能成群结队,从朝鲜半岛东渡日本,说明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也说明海上航路往来频繁。这些移民所经由的航路,基本上和以前一样,是从南朝鲜出发,经对马、壹岐等岛,在前肥的松浦靠岸,然后沿着九州北岸和濑户内海的岛屿港湾东上,在难波津附近登陆。他们之所以能大举迁移到日本,是同当时日本朝廷一再鼓励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日本政府为了利用这些移民的技艺,曾派人对他们进行诱导和表示欢迎。当这些移民被朝鲜半岛的新罗人所阻时,日本朝廷就特派得力将领,授

① 上述移民数字见《应神纪》和《古语拾遗》。

② 上引数字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1页。

以精兵,讨伐新罗,开辟了这条航道。

2.在这些移民中,有很多知识分子和能工巧匠。他们在传布文化上的影响,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范围很广,不胜枚举。但影响最深远、贡献最大的是养蚕和织绸技术的传入。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所说:“特别显著的是他们对于养蚕、织绸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①

对养蚕丝织业的贡献:这批秦、汉人移居日本后,日本的养蚕织绸立即有了显著的发展,早在仁德天皇时代(313—399)就把秦人分置在各郡,使之从事养蚕织绸,他们所贡献的丝绸质量优美,触肌肤而感温暖。据专家考证从月轮古坟出土的丝纤维,纤度比以前出土的粗25%,这与早期由功满王传入的蚕种是山东的三眠系蚕种,而这时可能已引进优良的江南四眠系蚕种有关。因此下诏赐姓为波多(Hata)公。日本的养蚕织绸业从此开创了新的局面。接着在雄略天皇十五年(471)又把分散居住的秦人等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人,赐以“秦酒公”令他们从事养蚕织绸。不久,他们献给朝廷的绢缣堆积如山,因赐姓为“太秦公”。次年又把他们分置在适于蚕桑的各国县。所有这些利用秦人的技艺来振兴日本的丝织业,取得显著的效果。移居日本的汉人精于织绸技术,在日本推广中国式的织绌技术,不久就能生产比较高级的绫锦了。因而给他们以“绌人”(Ayabito)的称号^②。

大批汉人渡海移居日本,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上只就丝织工业的发展谈些粗浅看法。他们不但是开拓东海“丝绸之路”的开路先锋,而且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 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3页。

② 《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4页。

五、隋朝时的东海航路和丝绸外传及其影响

隋朝时与南朝时的中日航路基本相同,都是从日本筑紫出发,不过在掠朝鲜半岛时,再沿辽东半岛航行,越渤海而至登州。从莱州登岸循陆路经青、兖、曹、汴各州而至洛阳以上航路就被称为北线(图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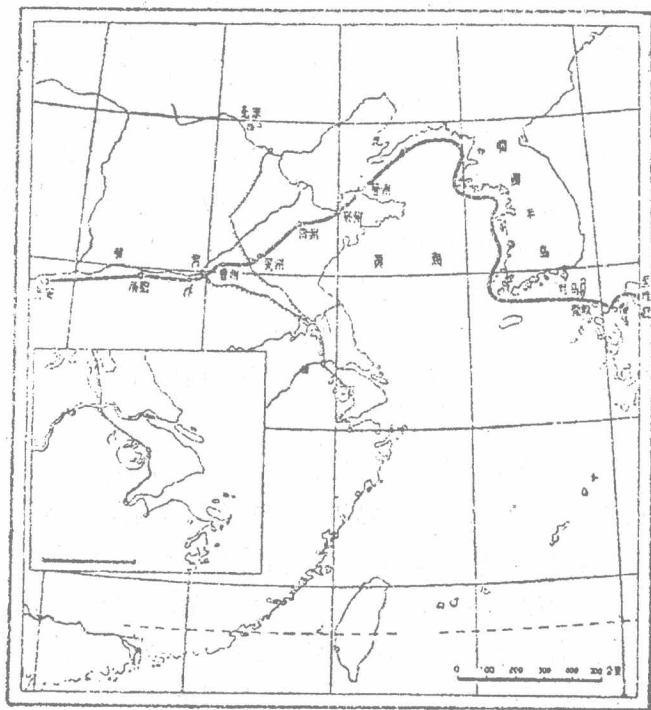


图 7—2 隋朝航路示意图

《隋书》中记载,从大业三年(600)开始,日本曾先后四次遣隋